

目 次

一八九六年

我的一生 一个内地人的故事 /3

一八九七年

农民 /89

佩彻涅格人 /121

在故乡 /131

在大车上 /143

一八九八年

在朋友家里 故事 /155

套中人 /174

醋栗 /187

关于爱情 /197

姚尼奇 /206

出诊 /225

一八九九年

宝贝儿 /239

新别墅 /251

公差 /266

带小狗的女人 /282

一九〇〇年

在圣诞节期 /301

在峡谷里 /307

一九〇二年

主教 /349

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年

补偿的障碍 /367

一封信 /376

一九〇三年

新娘 / 383

题解 / 402

在大车上

早晨八点半钟他们坐车出了城。

大路是干的，四月间灿烂的太阳照得人浑身发热，然而山沟里和树林里还有残雪。严寒的、阴暗的、漫长的冬季还没有走得那么远，春天却突然来了，然而对于目前坐在大车上的玛丽雅·瓦西列芙娜来说，温暖的天气也罢，让春天的气息烘暖的、懒洋洋的、透光的树林也罢，野外类似湖泊的大水塘上空那些黑压压成群飞翔的鸟儿也罢，美妙的、深不可测的、使人很乐于飞上去的天空也罢，都没有什么新鲜有趣的地方。她做教师已经有十三年了，在这些年里，她坐车到城里去取过多少次薪金，那是数也数不清了，不管是像现在这样的春天，还是下雨的秋日傍晚，还是冬天，对她来说都是一样，她总是一成不变地巴望着一件事：赶快走到目的地。

她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她在这一带地方已经生活过很久很久，将近一百年了。她觉得从城里到她的学校，一路上每块石头，每棵树，她都认得。这儿有她的过去，有她的现在，至于她的未来，那么除了学校、进城往返的道路，然后又是学校，又是道路以外，她就想不出什么别的前景来了。……

关于她做教师以前的往事，她已经不再去回忆，而且也差不多忘光了。从前她有父亲和母亲；他们住在莫斯科红门附近一个大宅子里，可是那一段生活在她的记忆里只留下一点模糊而朦胧的东西，像梦境一样。她十岁那年，她的父亲去世，过了不久，她的母亲也死了。……她有个做军官的哥哥，起初还通信，后来她哥哥不再回信，就此断了音信。旧日的东西保存下来的只有一张她母亲的照片，然而那张照片放在学校里受了潮，现在除去头

发和眉毛以外什么也看不见了。

等到车子走了三俄里光景，赶车的老人谢敏回过头来说：

“城里捉住一个当官的。他给押走了。听人说，他在莫斯科跟一些德国人把市长阿历克塞耶夫打伤了。”

“这是谁告诉你的？”

“这是在伊凡·约诺夫的饭铺里，人家在报纸上看到的。”

他们又沉默了很久。玛丽雅·瓦西列芙娜想着她的学校，想到不久就要举行考试，她得送四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应考。她正想着考试，地主哈诺夫坐着一辆四套马车从后面追上来了，去年，他曾在她的学校里当过主考官。他的马车走到跟她并排的时候，他认出她来，就点一下头。

“您好！”他说。“您这是回家去吧？”

这个哈诺夫是个四十岁上下的男子，脸色憔悴，神情萎靡，已经开始明显地变老，不过相貌仍旧漂亮，招女人喜欢。他一个人住在他那个大庄园里，从不出来工作。人家说他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做，光是在屋里从这头走到那头，嘴里吹着口哨，或者跟他的老听差下棋。人家还说他爱喝酒。确实，去年考试的时候，就连他带来的纸张也有香水和酒的气味。当时他穿一身新衣服，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很喜欢他。她跟他并排坐着的时候，老是觉得发窘。她看惯了冷漠而老练的主考官，这一个却连一句祷告词都记不得，不知道该问什么好，非常客气，殷勤，总是给学生打五分。

“我是到巴克维斯特那儿去，”他接着对玛丽雅·瓦西列芙娜说，“不过据说他不在家。”

他们离开大道，转到一条乡间土路上，哈诺夫走在前面，谢敏跟在后面。四匹马沿着土路一步一步向前走去，费力地拖着陷在烂泥里的沉重马车。谢敏赶着车子在那条土路上曲曲折折地往前走，时而走过土丘，时而走过草地，常从大车上跳下来，帮着马拉车。玛丽雅·瓦西列芙娜一直想着学校，想着这次考试的题目，不知道是难还是容易。她想到地方自治局就不痛快，昨天她在那儿一个人也没有找到。多么不成体统！两年以来她一直要求解雇学校里的看守人，此人什么活也不干，对她态度粗暴，打她的学生，可

是谁也不理她。在执行处要找到主席是困难的，即使找到，他也总是眼睛里含着泪水，说他抽不出工夫来。学监每三年到她的学校里来一次，对他的本行一点也不懂，因为早先他在税务局工作，托了人情才谋到学监的职位。校务会议很少召开，而且在什么地方召开也不得而知。督学是个识字不多的乡下人，他是制革作坊的老板，头脑不聪明，态度粗鲁，同那个看守人十分要好。上帝才知道她该去找谁诉说，要主意。……

“他确实漂亮，”她看哈诺夫一眼，暗想。

道路越来越糟。……他们的车子驶进一个树林。这儿的道路很窄，马车转不过身来，车辙很深，灌满了水，咕唧咕唧地响。带刺的树枝打人的脸。

“这叫什么路啊？”哈诺夫问，笑起来。

女教师看着他，不明白这个怪人为什么住在此地。在这个荒僻的地方，在这种满是泥泞、寂寞无聊的环境里，他的钱财、他的招人喜欢的外貌、他的文雅的风度对他能有什么用处呢？他在生活里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就拿眼前来说，他跟谢敏一样，在这极端恶劣的小道上慢腾腾地赶路，忍受同样的不方便。既然他能住在彼得堡，住在国外，那么何必住在这儿呢？看样子，要他这个阔人把这条坏路修成一条好路，免得受苦，免得看见他的车夫和谢敏的脸上露出绝望的神情，那是不算一回事的；然而他光是笑笑，显然，对他来说，什么都无所谓，他并不需要更好的生活。他善良、温和、天真，不了解这种粗鄙的生活，不熟悉它，就像在考试的时候不熟悉祷告辞一样。他仅仅捐给学校一些地球仪，就真诚地以为自己在民众教育方面是个有益的人和杰出的活动家。在这种地方谁需要他的地球仪啊！

“坐稳了，瓦西列芙娜！”谢敏说。

大车猛地一歪，差点翻了。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滚到玛丽雅·瓦西列芙娜的脚边来，这是她买来的东西。前面是一道爬上山去的黏土高坡，在弯曲的山沟里水声哗哗地响，水好像吞吃了这条路，在这种地方怎么能走车呢！马不住地打响鼻儿。哈诺夫走下车来，穿着他那件长大衣在路边走动。他觉得热了。

“什么样的路啊？”他又说，笑了。“照这样子不用很久就会把马

车弄坏。”

“谁叫您在这样的天气坐车出来！”谢敏严厉地说。“应该在家里待着才是。”

“在家里，老大爷，闷得慌。我不喜欢待在家里。”

挨着老谢敏，他显得身材匀称，精神挺好，可是他的步态有一种刚刚露头的迹象，表现出他已经像个中了毒的、衰弱的、接近灭亡的人了。树林里仿佛忽然弥漫着酒的气味。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害怕起来，开始怜惜这个不知因为什么缘故正在走向灭亡的人。她蓦地产生一个念头：如果她是他的妻子或者他的妹妹，那么她似乎就会献出她的全部生命，一定要把他从灭亡里拯救出来。做他的妻子？生活却安排成这个样子，一方面让他独自一人住在大庄园里，另一方面让她独自一人住在偏僻的村子里，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就连他和她互相亲近、彼此平等的想法都显得不可能，显得荒唐。实际上，全部生活的安排和人类关系的形成，已经到了不可理解的地步，只要你细细一想，就会感到可怕，心直往下沉。

“这真叫人不理解，”她想，“为什么上帝把漂亮的外貌、和蔼可亲的风度、忧郁而可爱的眼睛赐给软弱的、不幸的、无益的人呢？为什么它们那么招人喜欢呢？”

“我们要在这儿往右拐弯了，”哈诺夫坐上马车，说。“再见！一路顺风！”

于是她又想起她的学生，想起考试，想起看守人，想起校务会议。等到风从右边带来越走越远的马车的响声，她这些思想就同另一些思想掺和在一起了。她打算想一想那双美丽的眼睛，想一想爱情，想一想永远也不会有幸福。……

做他的妻子？早晨天冷，却没有人给她生炉子，看守人不知到哪儿去了；学生们天一亮就来了，带来许多雪和泥，吵吵嚷嚷；一切都那么不方便，不舒适。她的住处只有一个小房间，厨房也在这儿。每天下课以后她总是头痛，吃过饭以后，感到心窝底下烧得慌。她得向学生们收齐木柴费和看守人的工钱，交给督学，然后恳求他，那个肥头大耳、蛮不讲理的乡下人，

看在上帝分上送木柴来。夜里她总是梦见考试、农民、雪堆。由于过着这样的生活，她就变得苍老，粗俗了，变得不美丽，不灵活，笨手笨脚，仿佛她身子里灌了铅似的。她见了什么人都怕，当着执行处委员的面，或者当着督学的面，她总是站着，不敢坐下，她谈到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用敬称。她引不起别人的喜爱，生活乏味地过下去，缺乏爱抚，缺乏友好的关切，缺乏有趣的熟人。处在她这种地位，假如她真是爱上一个什么人，那会是多么可怕的事啊！

“坐稳了，瓦西列芙娜！”

又是一道上山的陡坡。……

她是由于贫困才做教师的，并没感到这个工作是她们的使命。她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使命，想到过教育的益处，她老是觉得在她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不是学生，也不是教育，而是考试。再者她哪儿有工夫想到使命，想到教育的益处呢？教师们、不富裕的医生们、医士们的工作都很繁重，他们甚至不去想自己在为理想服务，为民众服务，从而得到安慰，因为他们的头脑里经常装满了关于食粮、木柴、坏道路、疾病的念头。这种生活是艰苦而没有趣味的，只有像玛丽雅·瓦西列芙娜这种不声不响地听命负重的人才会长久地熬下去；而那些活跃的、神经质的、敏感的、常谈到自己的使命，谈到为理想服务的人却会很快厌倦，丢掉这种工作。

谢敏尽量挑选干一点、近一点的路走，时而穿过一个草场，时而从人家的后院走；可是走到这个地方，一看，农民不让过路，走到那个地方又是教士的地，没有通道，再走到一个地方又是伊凡·约诺夫从地主老爷手里买下的一块地，周围掘了一道沟。他们屡次拨转马头往回走。

他们来到下戈罗季谢。小饭铺附近停着几辆大车，车上装着大瓶的浓硫酸，地上满是畜粪，粪下面还有雪。饭铺里有许多人，都是车夫，这儿弥漫着白酒、烟草、熟羊皮^①的气味。人们大声谈话，安着滑轮的房门砰砰地响。隔壁是一家杂货铺，有人在拉手风琴，一分钟也不停。玛丽雅·瓦西列芙娜

^① 指他们身上所穿的羊皮袄。

坐下来喝茶。邻近的一张桌子边，有些农民在喝白酒和啤酒，他们浑身冒汗，那是由于刚喝过热茶，加上饭铺里闷热的缘故。

“你听着，库兹玛！”响起嘈杂的说话声。“那算得了什么！求上帝保佑！伊凡·杰敏狄奇，我能给你这么一下子！亲家，小心！”

有一个身材矮小的农民，留一把黑胡子，麻脸，早就喝醉了，忽然因为一件什么事大惊小怪，难听地骂起来。

“你在那儿骂什么呀？你！”谢敏坐在远处，生气地搭腔说。“难道你没看见这儿有一位小姐！”

“小姐……”有人在另一个墙角挖苦地跟着说。

“坏蛋！”

“我没什么……”矮小的农民发窘地说。“对不起。我花我的钱，小姐花小姐的钱。……您好！”

“你好！”女教师回答说。

“我满心感激您。”

玛丽雅·瓦西列芙娜愉快地喝着茶，自己也像农民那样热得脸红起来，她又想起木柴，想起看守人。……

“亲家，等一等！”从旁边桌子上传来说话声。“她是符亚左维耶村的女教师……我们认得！她是个挺好的小姐。”

“正派人！”

安着滑轮的房门老是砰砰地响，有些人走进来，有些人走出去。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坐在那儿，总是想那老一套，隔壁的手风琴也拉个不停。斑斑点点的阳光照在地板上，随后移到柜台上，墙上，最后完全不见了；可见太阳西斜，已是午后时分。旁边桌子上的农民们准备上路了。那个矮小的农民脚步有些歪斜，走到玛丽雅·瓦西列芙娜跟前，向她伸出一只手，别人学他的样，也伸出手来告别，陆续走出去，安着滑轮的门就吱吱地叫，砰砰地响了九回。

“瓦西列芙娜，动身吧！”谢敏招呼道。

他们上路了。马又慢腾腾地朝前走。

“不久以前这儿，在他们这个下戈罗季谢，造了一所学校，”谢敏回过头来说。“好大的罪过啊！”

“怎么办呢？”

“听说执行处主席往腰包里揣了一千，督学也揣了一千，老师揣了五百。”

“那个学校一共才值一千。造人家的谣言是不好的，老大爷。这都是胡说。”

“我不知道。……人家怎么说，我也就跟着说说罢了。”

然而事情很清楚，谢敏不相信女教师的话。农民们不相信她。他们总是认为她的薪金太大，一个月有二十一个卢布（有五个也就够了），认为她从学生们那儿收来的木柴费和看守人的工钱，大部分都被她吞没了。那位督学的想法也跟所有的农民一样，而他自己却在木柴上捞好处，而且瞒着上司凭他的身份向农民们要薪金。

谢天谢地，这片树林总算走完了，从这儿起到符亚左维耶村都是平地。前面的路已经不多：过了那条河，再穿过铁道，就到符亚左维耶村了。

“你往哪儿赶车啊？”玛丽雅·瓦西列芙娜问谢敏。“顺右边那条路过桥才对。”

“为什么？这边也好走嘛。河又不很深。”

“当心，别把我们的马淹死才好。”

“怎么会呢？”

“瞧，哈诺夫也坐着车过桥了，”玛丽雅·瓦西列芙娜看见右边远处有一辆四套马车，就说。“大概是他的车子吧？”

“是他。多半没碰上巴克维斯特。真是蠢货啊，求上帝保佑，他们顺那条路走，何必呢？从这儿走足足可以近三俄里呢。”

他们的车子往河边驶去。夏天，这条河水浅，很容易涉水走过去，将近八月照例就干涸了，然而现在，在春汛之后，这条河大约有六俄丈宽，水流湍急，混浊，冰凉；从岸坡到水边有几条新的车辙，可见已经有人从这儿赶车过河了。

“往前走！”谢敏怒气冲冲而又提心吊胆地吆喝道，用力拉住缰绳，扬起胳膊肘，仿佛鸟儿扇动翅膀似的。“走啊！”

那匹马走进河里，水没到它的肚子上，它站住了，可是立刻又使足力气往前走，玛丽雅·瓦西列芙娜的两只脚感到刺骨的寒冷。

“往前走！”她略微欠起身来，也喊道。“走啊！”

他们上岸了。

“这是怎么搞的，主啊，”谢敏一边整理马具，一边嘟嘟囔囔地说。
“地方自治局简直该死。……”

她的套靴和皮鞋里都灌满了水，连衣裙和皮袄的下摆以及一只袖子都是湿的，滴着水。糖和面粉也浸了水，这是最叫人难受的了，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只能绝望地举起双手，击着掌说：

“哎，谢敏啊，谢敏！……你这个人啊，真是的！……”

在铁道的道口上，拦路杆放下来了：有一列特别快车正从火车站开来。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在道口那儿站住，等那列火车开过去，冷得周身发抖。符亚左维耶村已经看得清了，——那绿屋顶的学校，那十字架映着夕阳、闪闪发光的教堂，火车站上的窗子也亮着，火车头里冒出粉红色的烟子。……她觉得好像样样东西都在冷得发抖。

后来，列车来了，车窗射出明亮的光芒，像教堂上的十字架一样，刺得人眼睛痛。在一节头等客车的车厢台上站着一个女人，玛丽雅·瓦西列芙娜仓促中看了她一眼：这是母亲嘛！长得多么像啊！她的母亲也有那么浓密的头发，也生着那样的额头，也那么低着头。于是十三年来她头一次栩栩如生、历历在目地想起她的母亲、父亲、哥哥、莫斯科的住宅、养着小鱼的玻璃鱼缸，总之连细微末节都想起来了。她忽然听见弹钢琴的声音、她父亲的说话声，感觉自己像那时候一样年轻、美丽，打扮得漂漂亮亮，待在明亮、暖和的房间里，四周都是亲人；欢欣和幸福的感觉忽然涌上她的心头，她兴奋得用手心按住太阳穴，温柔而恳求地叫道：

“妈妈！”

她哭了起来，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正在这当口，哈诺夫坐着那辆四套

马车来了，她看见他，就想象那种从来也没有过的幸福，微笑着对他点了点头，像对一个跟她平等、亲近的人那样，她觉得她的幸福，她的喜悦，在天空，在四处的窗子里，在树上放光。是啊，她父亲和母亲压根儿就没有死，她也压根儿没有做教师，那无非是一个漫长、沉闷、古怪的梦，如今她醒过来了。……

“瓦西列芙娜，上车吧！”

忽然一切都消失了。拦路杆慢慢地升上去。玛丽雅·瓦西列芙娜索索地抖，冷得周身发僵，坐上那辆大车。那辆四套马车穿过铁道，谢敏跟上去。道口上的看守人脱掉帽子。

“瞧，前面就是符亚左维耶村。我们到了。”

一八九八年

在朋友家里

故 事

早晨来了一封信：

亲爱的米沙^①，您把我们完全忘记了，请您赶快来，我们要见一见您。我们俩跪下来恳求您，今天就来吧，叫我们看看您那对明亮的眼睛。我们焦急地等着您。

塔和瓦

六月七日于库兹明吉

这封信是塔契雅娜·阿历克塞耶芙娜·洛塞娃写来的，十年到十二年前波德果陵住在库兹明吉的时候，大家都简单地叫她“塔”。然而瓦是谁呢？波德果陵忆起那些冗长的谈话、欢畅的哄笑、谈情说爱的韵事、傍晚的散步、一大群当时住在库兹明吉以及它附近的姑娘和年轻的女人，于是想起一张普通的、活泼的、聪明的脸，脸上生着雀斑，跟深棕色的头发十分相配，这人就是塔契雅娜的朋友瓦丽雅，或者叫瓦尔瓦拉·巴甫洛夫娜。她在医学专科学校毕业以后，在图拉城外一个工厂里供职，现在看来到库兹明吉做客去了。

“可爱的瓦呀！”波德果陵沉浸在回忆里，想道。“她多么招人喜欢啊！”

塔契雅娜、瓦丽雅和他差不多同样年纪；可是那时候他是个大学生，而

她们却已经是成年的、将要出嫁的姑娘了，都把他看做孩子。现在呢，虽然他已经做了律师，头发开始斑白，她们却仍旧叫他米沙，认为他年轻，说他在生活里还什么都没有体验过。

他很喜欢她们，不过与其说是真正喜欢她们，倒不如说是似乎在回忆中喜欢她们。他对她们现在的情况不熟悉，不理解，很生疏。就连这封简短而调皮的信也是生疏的，她们大概写了很久，很费力，塔契雅娜写信的时候，她的丈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多半站在她的背后。……库兹明吉作为陪嫁赠给新婚夫妇不过是六年前的事，可是已经被这个谢尔盖·谢尔盖伊奇糟蹋掉了，现在他每逢要到银行里去付款或者为抵押契约付款，总要来找波德果陵，要他出主意，就跟找律师出主意一样，而且不光是如此，他已经有两次开口向他借钱了。显然，目前他们就是打算向他要主意或者借钱。

库兹明吉不再像从前那样吸引人了。那儿一片凄凉景象。再也没有欢笑，没有热闹，没有高兴的、无忧无虑的脸容，没有安静的月夜的幽会，主要的是再也没有青春了；再者，所有那些东西大概只有在回忆中才会迷人。……除了塔和瓦以外，那儿还有一个娜，她是塔契雅娜的妹妹娜杰日达，大家不论是开玩笑或者认真，总是把她叫做他的未婚妻；他是亲眼看她长大成人的，大家指望他会跟她结婚，有一个时期他也真是爱上她，准备向她求婚，可是现在她已经二十四岁，而他至今还没有结婚。……

“哎，这都是怎么搞的，”现在他暗自想着，困惑地把信重看一遍。
“可是，不去一趟不成，她们会生气的。……”

他很久没有到洛塞夫家去了，这像一块石头似的压在他的良心上。他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一阵，想了一忽儿，就硬逼着自己作出决定，到他们家里去住上三天，尽一下自己的义务，然后就可以自由自在，心安理得，至少拖到来年夏天再去了。早饭以后他动身到布列斯特火车站去的时候，对仆人说，他过三天就回来。

从莫斯科到库兹明吉要坐两个钟头的火车，然后从火车站出来，再坐大

① 米哈依尔的小名。

约二十分钟的马车。从车站上就可以看见塔契雅娜的树林和三座又高又窄的别墅，那是洛塞夫在婚后头几年干各种投机生意的时候开始建造而没有造完的。弄得他破产的不仅是这些别墅，还有各种农业方面的经营，还有那些频繁的、到莫斯科去的旅行；他到了莫斯科，就在斯拉维扬斯基市场吃早饭，在隐庐饭店吃午饭，傍晚总是到小布龙纳亚^①或者席沃杰尔卡^②去跟茨冈人玩乐（他把这叫做“散散心”）。波德果陵自己也爱喝酒，有的时候喝很多，也不加选择地跟女人们周旋，然而并不起劲，冷冷淡淡，感觉不到什么欢乐，每逢他亲眼看到别人热心干这种事，他总是生出嫌恶的心情，他不了解那些在席沃杰尔卡觉得比在家里跟正派女人在一起自由得多的人，他不喜欢这种人；他总感到种种不干不净的东西像牛蒡似的缠住了他。他也不喜欢洛塞夫，认为他没有趣味，什么事也不会做，是个懒人，跟他在一起不止一次地生出嫌恶的心情。……

他一走出那个树林，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和娜杰日达就迎着他走过来。

“我亲爱的，您怎么把我们都忘了呢？”谢尔盖·谢尔盖伊奇跟他吻了三次，然后两只手搂住他的腰，说。“您简直不喜欢我们了，好朋友。”

他的脸盘很宽，鼻子肥大，淡褐色的胡子相当稀疏。他学商人的样子把头发往一旁梳，要显得像个普通的、纯粹的俄罗斯人。他讲话的时候把嘴里的气直喷到对方脸上，不说话的时候就用鼻子喷气，呼呼地响。他那营养良好的身体和过分的饱足弄得他不舒服，他为了呼吸得畅快点，老是挺起胸脯，这就给他添上傲慢的样子。他身旁站着他的妻妹娜杰日达，显得很秀气。她生着淡黄色的头发，脸色苍白，眼睛善良而亲切，身材匀称；至于她漂亮不漂亮，波德果陵就弄不清楚了，因为他从她小时候起就认得她，对她的相貌看惯了。此刻她穿一条敞着领口的白色连衣裙，她那裸露的、白白的长脖子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新奇而且不大愉快的。

“我和姐姐从早晨起就在等您了，”她说。“瓦丽雅在我们家里，她也在等您。”

^{①②} 莫斯科郊外类似夜总会的饭店。

她挽住他的胳膊，忽然无缘无故地笑起来，轻松畅快地叫了一声，仿佛突然给一种什么思想迷住了似的。田地里长着开花的黑麦，在安静的空气里一动也不动，树林被阳光照着，这些都很美。在波德果陵身旁走着的娜杰日达，仿佛直到现在才发现风景很美似的。

“我到你们家里来住三天，”他说。“对不起，这以前我怎么也离不开莫斯科。”

“不好，不好，您把我们完全忘记了，”谢尔盖·谢尔盖伊奇用好意的责备口气说。“决不会！”^①他忽然说，同时打了个榧子。

他有一个习惯，常常在谈话的时候出乎对方的意外，用惊叹的形式说一句与谈话毫不相干的话，同时弹指作声。他老是在模仿什么人；如果他转动眼珠，或者随随便便地把头发往后一甩，或者装出慷慨激昂的样子，那就是说，前一天他去过戏院或者参加过有人发表演说的宴会。现在他踩着碎步走路，膝盖也不弯，像个痛风病患者，大概也是在模仿什么人吧。

“您要知道，塔尼雅^②不相信您会来，”娜杰日达说。“可是我和瓦丽雅都有预感。不知什么缘故，我知道您准会坐这班火车来。”

“决不会！”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又说一遍。

那两个女人在花园里露台上等着。十年前波德果陵（那时候他是一个穷大学生）教娜杰日达算术和历史，她家供他伙食和住宿；当时瓦丽雅是专科学校的学生，顺便在他这里学拉丁语。塔尼雅呢，那时候已经是漂亮的成年姑娘，除了恋爱以外什么也不想，一心巴望爱情和幸福，热烈地巴望着，期待着她日夜梦想的求婚男子。现在她已经三十多岁，仍旧像从前那么漂亮、体面，穿一件宽大的罩衫，两条胳膊又白又胖，她只关心自己的丈夫，关心自己的两个小姑娘。她的脸上带着这样的一种神情：虽然眼下她在说话、微笑，可是她心里想着别的，她时时刻刻在保卫她的爱情和她对这种爱情的权利，如果有人要夺去她的丈夫和孩子，她就随时会扑到这个敌人身上

^① 原文为法语。

^② 塔契雅娜的爱称。